

三彩太极图执壶是辽瓷巅峰之作

本报记者 朱忠鹤

本期导读

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一件精品辽瓷——三彩釉印花太极图执壶(以下简称“三彩太极图执壶”),壶体作扁圆形,壶身中心一朵莲花内印太极图式花纹,由此得名。它是契丹人生产、制造的生活用具。这种造型的陶瓷器源头可以追溯至西汉时期,发展到辽代时,成为精美的陶瓷器,足见中原文化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。

文物档案 三彩釉印花太极图执壶

图片由辽博提供) 瓷中的佳作。(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,本版制作精细,花纹别致,装饰富丽,是辽代陶器于天道的审美意境。此壶构思巧妙,内饰有太极图式花纹,勾画出始于天然,身两面印相同的凸起花纹,中心一朵莲花,质灰白闪红,通体施黄、绿、白三色釉。壶契丹人生活用具,壶体呈扁圆形,胎



重拾辽瓷技艺 也是“让文物活起来”

朱忠鹤

实事求是地说,对辽瓷,一些人至今仍感陌生,这并不奇怪。时隔1000余年,时间稀释掉了记忆,对于当时并不显重的辽瓷来说,这种遗忘更加明显。

幸运的是,在辽宁,现在有一批人正在努力复原辽瓷传统烧造技艺,并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知晓并喜欢上了这种沉重敦厚、色彩浓烈、粗放大气,具有北方古代游牧民族风格的瓷器。

在沈阳市一家辽瓷工坊,我被满目琳琅的现代辽瓷作品深深吸引。这其中,既有原汁原味复原了千余年前的辽三彩海棠盘、摩羯鱼壶、凤首壶等具有典型辽瓷特征的精巧作品,也有茶盏、杯托等具有当时中原韵味但经过了改良和创新的瓷器。总之,这是在遵循传统辽瓷烧制技艺的基础上,又结合现代工艺大胆创新的尝试。

在与工坊负责人谷翠国交流的过程中,我从他的眼中看到了希望。他说,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崛起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

国内烧制的具有典型地域风格的瓷器作品,辽瓷即是其中之一。虽然辽瓷分为“契丹式”与“中原式”两大类,但在南方地区销售展示时,他只携带复制的“契丹式”辽瓷作品参展,而最受欢迎的是“辽三彩”。

这是令人欣喜的态势。复制的辽瓷作品是基于文物的创新,相较于文物“只可远观、不可把玩”的遗憾,这些现代辽瓷作品既可以收藏,还可以拿在手上慢慢地欣赏,这正是“让文物活起来”的另一种表达。

不仅如此,随着辽瓷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并接受,附着在辽瓷作品上的“辽文化”也被更多人了解与熟悉。“辽文化”是辽宁主要地域文化之一,这在多个层面都有所体现,比如,我省境内不仅密布着辽代古塔,还可以找寻到辽代城池的踪影,就连省内的一些地名也直接起源于辽代。从这个角度看,现在辽瓷的声名日隆,不仅可以“让文物活起来”,还可以助推辽宁文化火起来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,辽瓷技艺的传承与推广,势在必行。

“辽三彩”继承了“唐三彩”

三彩釉印花太极图执壶是辽代实用器具,通高21厘米、口径3.7厘米,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。

这样一件辽代瓷器,因其造型独特、构图别致、色彩艳丽而在辽博收藏的众多辽瓷中格外引人注目。

对这件文物,辽博文字资料这样介绍:“壶体作扁圆形,圆口,曲柄,管状短流,圈足。胎质灰白闪红,挂白粉,通体施黄、绿、白三色釉。水波纹地,上浮有如意流云带。柄外施绶带纹,流基部作牛首张口状。壶身两面印相同的凸起花纹,中心一朵莲花内饰有太极图式花纹,勾画出‘始于天然,载于天道’的审美意境。此壶构思巧妙,制作精细,花纹别致,装饰富丽,是辽代陶瓷中的佳作。”

“很多人知道‘唐三彩’,‘辽三彩’却很少有人知道。这件三彩太极图执壶是‘辽三彩’中的巅峰之作。”今年88岁高龄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关宝琮,长期从事绘画创作及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科研工作,被誉为“北瓷第一人”。对于这件执壶,关宝琮做出这样的评价。

关宝琮说,“辽三彩”和“唐三彩”一样,都是低温瓷釉陶。虽然继承了“唐三彩”的烧制工艺及一定的艺术风格,但二者有很多区别。首先在用途上,“唐三彩”更多以祭祀用品和明器的形式出现,

“辽三彩”则主要是碗、盘、杯、壶等实用生活器具,如鸡冠壶、海棠花式长盘等。这些富有契丹游牧民族特色的瓷器都是“辽三彩”的代表作品。

其次,色彩上不同。虽叫“三彩”,但“唐三彩”实际上包括黄、绿、蓝、白等多种颜色。“辽三彩”的颜色则单调了许多,多为黄、白、绿这三种颜色,没有蓝色。

再有就是釉面不同。“唐三彩”的釉面自然流动,斑驳华丽,而“辽三彩”的釉面没有交融感,釉面流动感较差,缺少华丽感。

关宝琮说,“辽三彩”只是辽瓷中的一类。对于辽瓷的定义,一般认为是辽境内出土的辽代瓷器,有狭义和广义之分。狭义的辽瓷主要是指其疆域内的陶土烧造,并为契丹人所用的陶瓷器;广义的辽瓷则指除了契丹人所用陶瓷器之外,也包括辽境内汉人使用的定窑、磁州窑等窑址生产的器具。一般而言,辽瓷多指其狭义概念。

辽瓷技艺传承人、烧制辽瓷多年的谷翠国告诉记者,正是基于辽瓷的狭义和广义定义,辽瓷分为两大类,一类为契丹式,契丹民族粗犷、刚烈、剽悍的民族性格均投射在辽瓷上,鸡冠壶、凤首瓶等都是典型代表;一类是中原式,即中原地区烧制并使用的瓷器,有些生活中使用的瓷器在辽境内也有烧制。

契丹社会受中原文化影响深远

“我认为,三彩太极图执壶是一件很特别的文物,这种器型的源头可追溯至汉代或更早。”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扬之水长期从事古代器物研究,她对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辽代器物十分看重。

扬之水说,小口、两肩有系的扁壶,在先秦时已经出现,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在当时叫什么名字。汉代有了名称,叫“榑”(读bēi,古代酒器)。著名的一件,便是出土自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的“彩绘七豹纹漆扁壶”。

“彩绘七豹纹漆扁壶”的基本式样是近乎椭圆的造型,细颈,小口,两肩一对系,穿了绳,小者可手提,大者可肩抬,在流传至今的汉代图画中都能看到。榑也有做成动物形的,如出土自陕西榆林走马梁汉墓的铜鱼榑。可以认为,榑的主要特色是便于携带。

汉朝之后,榑的名称依然在使用。魏晋时期,还有一种自铭为“埤”(读jī)的器物,如浙江上虞出土的西晋青釉贴花六系扁壶、江苏金坛出土的西晋青釉刻花双鼠系扁壶。铭文中的“埤”通榑。

魏晋南北朝以后,榑的名称渐渐消失,“榑”(读kē,古代酒器)的叫法沿用下来,且多指用作盛酒的便携式小口扁壶。如唐朝诗人白居易《白咏》中有“金章未佩

虽非贵,银榑常携亦不贫”之句。此前已有的形状像鱼的榑,为唐、辽所继承,常常做成双鱼的样式,如白居易《家园三绝》其二写道:“何如家酝双鱼榑,雪夜花时长在前。”

双鱼榑有陶瓷器,也有金银器。如扬州市出土的唐三彩双鱼榑、河北省井陘县出土的晚唐五代白釉鱼榑,都是陶瓷器具。而赤峰两处窖藏出土的金花银双鱼榑为金银器,它们是一对摩羯变身作贴体相对的双鱼,造型上保留了摩羯长鼻翻卷的特征,两肩各有环,穿提梁。壶嘴有盖,盖顶有一个宝珠钮。此外,还有一种鱼榑,如白居易《东城晚归》诗中咏:“一条邛杖悬鱼榑,双角吴童控马街。”还有一种革制的盛酒器,叫酒盎。

扬之水表示,无论早期还是后来的榑、鱼榑、龟榑、酒盎以及所谓“背崕”(读wēi,同甕),皆有口无流(即我们常说的壶嘴儿)。虽然小口用于斟酒也还方便,但毕竟不如设有管状流倒酒来得稳妥。于是辽代又出现一种新的扁壶样式,其代表作就是把三彩太极图执壶——它的一侧有环柄,另一侧有短流。与环柄相对的一侧有一个环耳,如此便成可以穿绳提挈的一对系,又是酒盎的形制。从造型到图案,足见中原文化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深远影响。

辽瓷与中原陶瓷一脉相承

辽博藏“三彩釉印花太极图执壶”是由原东北文物管理处拨交过来的,其“身世”是个谜。对于辽瓷的发展历史,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意见认为,辽瓷的制作如果按照时间轴线划分,可以分为早、中、晚三期。

关宝琮说,早期,也就是辽太祖至辽穆宗(公元916年至969年)这段时期,辽瓷主要以陶器为主,夹砂陶罐、盘口瓜棱壶是较为常见的组合,釉陶与瓷器比较少见。鸡冠壶、长颈壶等是这一时期较为常见的器型。这一时期的辽瓷装饰极为简单,崇尚朴素风格,大多为单色釉。

到了中期,即辽景宗到辽兴宗(公元970年至1055年)时期,随着辽朝经济的发展与文化日渐繁荣,这一时期的辽瓷也随之发展起来。较之早期,这个时期的辽瓷在装饰上变得复杂,装饰技法明显增多,但色釉装饰仍以单色釉为主。工匠开始有意识地在单色釉中增加彩色装饰。

花纹装饰的大量出现也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色。在鸡冠壶等器物上盛行刻

画卷草纹、葡萄纹等纹样。与陶器数量较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这一时期的辽瓷器型愈加丰富多彩。在造型上,穿孔型鸡冠壶已由单孔逐渐变为双孔,而且管状口上多有器盖,提梁型鸡冠壶明显增多。

辽代晚期指的是辽道宗到辽天祚帝(公元1055年至1125年)时期,辽瓷风格有了明显转变,这一时期也是辽瓷的突变期。关宝琮表示,到了晚期,蕴含着契丹民族风韵的器物急剧减少,与此同时,中原地区传统形式的器物增多,且造型趋于简化。就装饰特点而言,绚丽多姿的印花三彩釉器打破了单色釉器一统天下的局面,单色釉和三彩釉两种装饰技法并驾齐驱。单色釉的器型仍是鸡冠壶、长颈瓶等,而三彩釉较为常见的则是海棠花式长盘、花口碟等器皿。

“辽瓷的生产与中原陶瓷生产一脉相承,并展现了自身的民族特色。随着契丹封建化与汉化程度的日益加深,辽瓷与中原陶瓷风格渐趋一致,最终走向了融合。”关宝琮总结道。



更多精彩内容 扫码观看

本期专家支持 关宝琮 谷翠国 扬之水